

20 世纪 60 年代初 江苏省社办工业调整述论

柳 森

内容提要 “大跃进”期间,农村掀起了大办工业的狂潮,加上追求“一大二公”,强调发展社有经济,农村工业很快变成单一社办工业。盲目发展起来的社办工业远远超过了农业的承受能力。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国家对社办工业进行了大力调整。江苏省社办工业调整,压缩了社办工业规模,改变了农村工业集中在公社的局面,把农村企业的公社大集体所有制变为生产大队、生产队甚至个体的更小的所有制,恢复了农村家庭副业、农村小手工业以及小商小贩,为搞活农村经济,丰富人民生活,为江苏省国民经济的好转创造了条件。

关键词 社办工业 兴起 调整 江苏省

柳 森,南开大学中国史博士后工作站 300071

学界对社办工业的研究已经有很多研究成果出现,但是,目前的研究成果对该问题或一言带过,或笼统叙述,或停留在国家政策的宏观分析层面,而对基层根据自身实际,具体执行国家社办工业政策的微观层面,鲜有涉及。本文试图以江苏省社办工业为个案,来研究 20 世纪 60 年代初江苏省社办工业调整。

一、“大跃进”运动中社办工业的兴起

1958 年 1 月,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会后通过的《工业方法六十条(草案)》要求:“各地方的工业产值(包括中央下放的厂矿、原来的地方工业和手工业的产值,不包括中央直属厂矿的产值),争取在五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十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并要求“各省市对于这件事要立即着手订计划,今年七月一日前订出来”^[1]。这一号召的出台,加上“大跃进”全面展开,为全国农村生产队、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大办工业拉开了序幕。这些工业当时被叫做社队企业或社队工业,中国社队企业主要有三个来源:(1)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传统副业和手工业是社队企业的主要来源;(2)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兴办的社队企业;(3)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下放给公社经营的原属国家经营的集体工业和国营工商业事业单位。1958 年末,搞“穷过渡”,农村生产队、生产大队所办工业被收归社办,所以,这些工业始称社办工业或社办企业。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1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2 页。

抗日根据地生产展览会的 兴起及其运作模式

万立明

内容提要 举办生产展览会是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创造出来的一种行之有效的促进生产建设的办法。陕甘宁边区最早举办且次数最多,进而推广到其他抗日根据地,并逐步常态化、制度化。党和边区政府逐渐摸索出一套卓有成效的运作模式,包括举办生产展览会的前提条件、组织和制度保障、重要保证、重要策略和核心目的等。这五个方面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也是生产展览会有效运作的基础。这是中共领导新民主主义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实践,对今天仍有诸多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 抗日根据地 生产展览会 运作模式

万立明,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200433

举办生产展览会是促进经济发展、技术推广和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抗日根据地政府积极举办了各类生产展览会。近年来,关于陕甘宁等抗日根据地的生产展览会,已经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大多局限于展览会对边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就抗日根据地生产展览会本身系统、全面的研究却并不多见。实际上,抗日根据地在不断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生产展览会的运作模式,对今天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抗日根据地生产展览会的兴起

举办生产展览会是一个教育和动员群众且群众乐于接受的好办法。1938—1939年,生产展览会率先在陕甘宁边区产生并得到初步发展。1938年1月举办的延安工人制造品竞赛展览会便首开先河。这次展览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陈云、李富春等43人亲自倡导和赞助,他们签署的《缘起》中阐明办展的宗旨是:“为更广泛地动员和鼓励战时生产,提高工人的热忱和纪律性,奖励改良生产技术求和生产工具,促进国防经济建设,完成工人阶级在国防经济建设中,在民族自卫战争中的任务。”^[1]

1938年8月3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团决定“由建设厅组织一次生产展览会”,并宣布“为了办好这次展览会,主席团捐款1800元作为展览和奖励之用”。同年9月15日,正式公布《筹备陕甘宁

[1]正义:《延安工人制造品竞赛展览会志》,《新中华报》1938年1月10日。

抗战时期江南城镇的生活与变化

林 涓 冯贤亮

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以太湖平原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处于中日战争的前沿,城乡普遍遭受重创,经济萧条,社会秩序更形混乱;而且很多城镇在沦陷后,还受到日伪的经济封锁和清乡扫荡。在此期间,不少城镇却出现了短暂的畸形繁荣,与那些饱受兵燹的城镇相比,呈现了一幅异样的图景。但不管怎样,八年抗战,仍使尚未从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下恢复过来的中国,再度陷入深重的灾难,打断了地方工业化即现代化的进程,无论城乡,所蒙受的巨大创伤,主要在于经济的萧条、社会秩序的混乱、人口的损失或流失、城镇的破毁等方面,无不显现出彼时民生的苦痛。

关键词 抗日战争 江南 城镇 生活变化

林 涓,复旦大学政治学系讲师 200433

冯贤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200433

一、引言

唐宋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最为繁荣的地域江南,一直是全国的财赋重地、人文渊藪。其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的中心,主要呈现于各类规模不等的城市与市镇,在明清时代显得十分昌盛^[1]。就江南的核心太湖平原而言,环太湖的大城市,到民国时期就有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嘉兴、吴兴(湖州)、杭州等。至于市镇,在数量上就显得更多一些。

从1912到1936年,江南的发展,虽然也经历了齐卢之战、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期的经济危机,但在总体上,较中国其他地域为良好,从而也成了世人向往的重要生活地域。民国时人就说,这个“江南”是“一个多重性格的流域”,即从经济上看,“江南是一个都市线”;从人文的观点上看,“江南是物质文明最高度的区域”;从政治上看,“江南是现在政治机构的中枢”^[2]。

江南地域不广,仅包括苏南镇江以东的苏锡常,上海市,浙北杭嘉湖地区和杭州市及其所属余杭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09CZZ003)阶段性成果。

[1]参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2]刘翔:《江南社会的解剖与再造》,《新运月刊》1936年第34期,第51页。

近代长三角地区打工妹就业路径探析

池子华

内容提要 本文以长三角地区为中心,对近代打工妹群体就业路径进行考察。社会网络或者说社会资本,在打工妹求职过程中的作用非同一般,社会关系网甚至成为她们求职的“路径依赖”,在其职业生涯中不断得到强化。另一方面,用工单位主动“出击”招工,根据职业的性质寻求打工妹的“职求”路径,同样不能小视。招工是“职求”的基本途径,而在招工名义之下,形成了多种模式或路径,其中委托代理、“养成”招工、招考为基本模式。同时,劳务中介也为她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牵线搭桥”,提供了另外的选择。劳务中介在近代长三角城市中最常见者莫过于荐头店和职业介绍所。如果说荐头店是打工妹从家庭走向家庭的桥梁的话,那么职业介绍所则为打工妹从家庭走向工厂、企业等更广阔的领域搭建了平台。

关键词 近代 长三角地区 打工妹 就业路径

池子华,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学系教授 215123

近代长三角地区是打工妹最为集中的地区。她们无论来自长三角本区,还是区外,都渴望谋得一份职业,或者被职业配置到适合她们的岗位上,如时人所说,“很显然的,女工在合乎她们性格的职业里就业,也许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解释。还是人选职业?抑或是职业选人?……出于职业的性质,而挑选着不同的人来从事生产,为什么女工多集中在纺织工业中,而在其他的工业如机器印刷等就很少了?不是可以说明职业挑选着不同性别的工人吗?”^[1]这里的“人选职业”、“职业选人”固然是就打工妹的职业状况而言,但另一方面,“人选职业”和“职业选人”,换句话说“求职”和“职求”的过程,也非一帆风顺,特别是“求职”的历程,曲曲折折,充满艰辛。“人选职业”——“求职”,体现出打工妹的主动性,而“职业选人”——“职求”则体现出用人单位的主动性。路径不同而“异曲同工”,都是为了实现人与机器或者说人与物质生产资料的结合。本文就“人一机”结合实现的路径进行探索,以揭示打工妹群体在长三角劳务市场上的沉浮。

一、社会关系网络的路径依赖

在进城务工的打工妹群体中,个体的自主进入和随家庭的迁移,都占有相当的比重,这从1933年

[1]陈达:《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市镇工人生活》,〔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3年版,第518页。

政俗关系视野下的民国“新年”之争

——以《申报》为中心

忻平 张坤

内容提要 民国时期政府奉阳历为国历,民间则仍沿用阴历,由此形成了新旧两个新年并存的局面。社会上围绕过哪个新年、春节存废等问题产生了广泛争论,最终政府实行了废除春节的政策并以失败告终。新年之争客观上传播了现代文明的要素,推动了传统节日习俗的现代转型。废除春节政策的失败,启示我们在改造习俗的过程中应尊重生活的逻辑,采用渐进的方法,尤其要处理好习俗变迁与政治变革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新年 元旦 春节

忻平,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200444

张坤,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200444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正式通电各省,改用阳历,以阳历为标准纪年。然而,之后无论是在岁时节日的庆祝,还是民间商业款项往来,民间仍习惯用阴历,由此形成了所谓的“历法二元社会”^[1]。1914年,鉴于“国民心理上仍不能举阴历观念尽行铲除”,北洋政府内务部在致袁世凯的呈文中提出:“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2]由此,在全国范围内传统农历新年岁首被易名为“春节”,传统的“元旦”则被安置在阳历的1月1日头上,形成了“新新年”和“旧新年”的并立。民国时期政治与民俗持续互动,在新年这个问题上有比较集中的体现。围绕过哪个年、春节的存废等问题,《申报》发表了大量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文章,形成了所谓的“新年”之争,具体以1919和1927年为节点,分为了三个阶段:

一、两个新年并存局面的形成(1912-1919)

1912年至1920年总体上而言,“新新年”与“旧新年”并行不悖,“阳历与阴历并行,新年与旧年交错”^[3]。“新新年”依据的是由西方传入的阳历,“旧新年”依据的是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阴历,正是由于

本文系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近代以来上海春节文化的嬗变与传承”(项目编号:12ZS089)阶段性成果。

[1]左玉河:《评民初历法上的“二元社会”》,〔北京〕《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

[2]《四时佳节之新规定》,《申报》1914年1月13日。

[3]《新岁纪》,《申报》1917年1月1日。